

何康文集

(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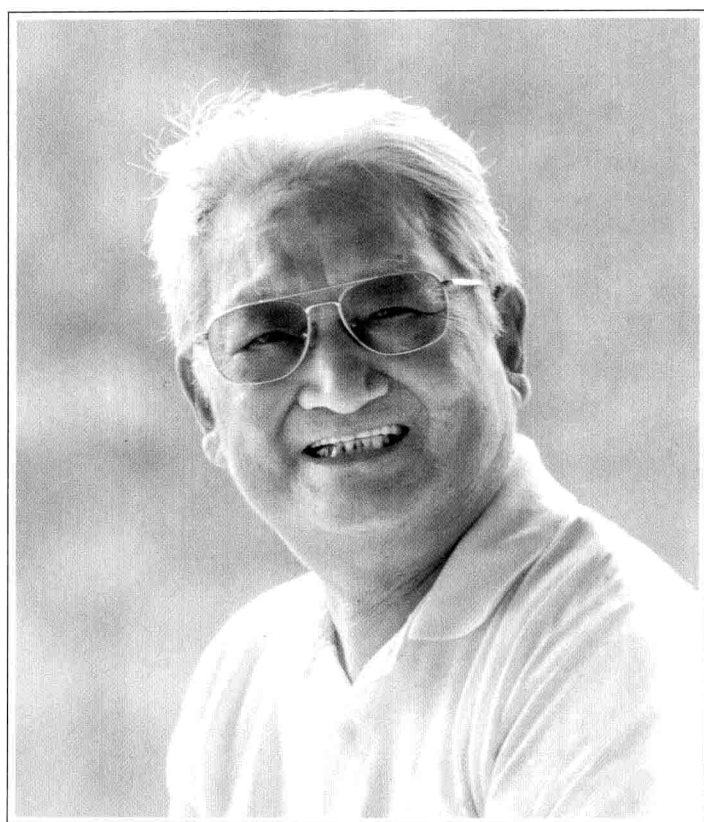
人民教育出版社

何康文集

(上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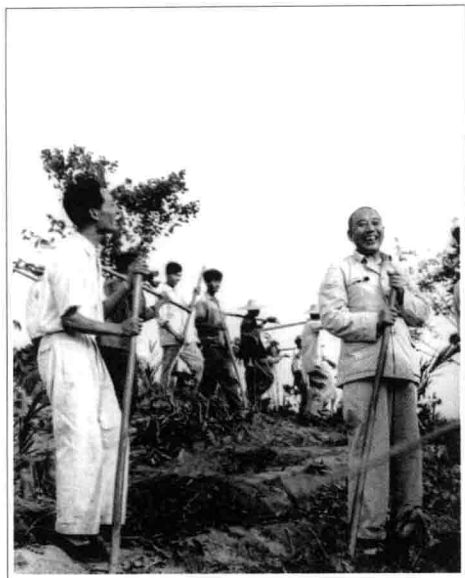
▲ 1951年摄于上海，为新中国建立后首张家人合影：居中坐者为父何遂，母陈坤立。何遂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司法部部长、后排右二为何康，时任华东农林部副部长，右一为小弟何达，正上公安学校，右三为大哥何世庸，时为两广盐务局局长，右四为二哥何世平，时在华东局作对台工作，右五为妹妹何嘉，在新华社工作，何康兄妹皆为中共党员。



▲ 1949年上海解放，何康参与接管工作，任上海市农林处处长，50年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被任命为农林部副部长，时27岁。



▲ 1952年，何康调往北京，参与了我国橡胶种植事业的工作，先后在林业部、农业部、农垦部任特种林业司、热带作物司长，此为1959年他陪同他的老领导、曾为首任华南垦植总局局长叶剑英（左二）视察橡胶园。



◀ 1957年，何康调任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所长，遵农垦部部长王震指示，1958年将研究所由广州迁往生产第一线，在海南儋县设立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并创立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称为“两院”），此为1960年王震、何康与两院职工一起开荒种粮。

► 1960年2月，周恩来总理视察两院，何康向总理介绍热带作物产品，何康身后为他夫人，两院财务处处长缪希霞。周总理视察过后，一定要去何康家看看，后将何康家门口的春联“儋州落户、宝岛生根”改为“儋州立业、宝岛生根”，这成为“两院”的院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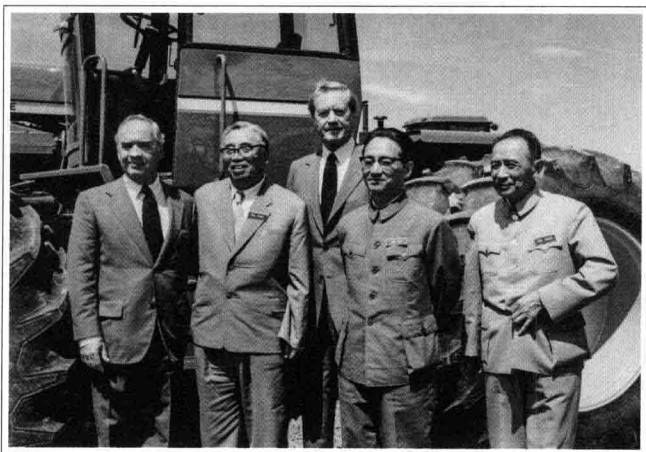


► “文革”中，1974年恢复工作，任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生产部副部长的何康，到农场考察工作。





◀ 1977 年何康调回北京，任农林部副部长，1979 年调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任副主任，后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83 年任农业部部长。这是他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万里（右一）汇报工作。



◀ 1978 年，何康作为副团长兼秘书长首次对美国农业进行了 40 天的考察，考察归来向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等中央领导汇报了国际农业现代化的进展及中国可借鉴的经验。左二为考察团团长、时任黑龙江省第一书记的杨易辰，右一为副团长湖北省第一书记赵辛初，右二为何康。



◀ 科教兴农是何康工作重点之一，1984 年何康重返“两院”，视察“两院”科学实验室。



◀ 1986年9月，何康（左二）陪同邓小平（左四）、杨尚昆（右二）接见陈立夫的儿子陈泽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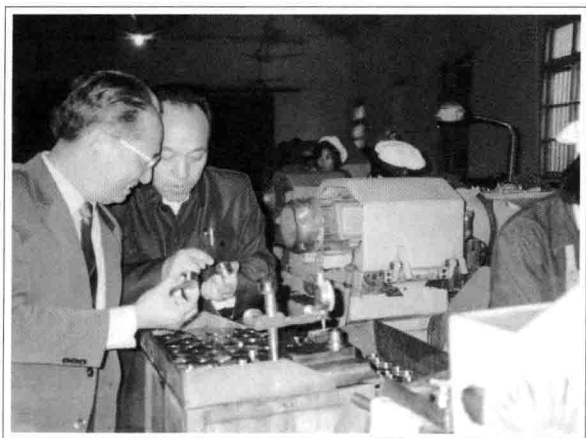
◀ 何康在任期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他兼任了首届乡镇企业协会会长，1986年何康陪同乡镇企业协会名誉会长薄一波召开乡镇企业座谈会，左一为中央农村工作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左二为薄一波，左三为何康，左四为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

► 心系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1986年冬何康视察凉山彝族自治州。



► 1986年何康在河北霸县与农民一起过春节。





◀ 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右)向何康介绍万向产品。



◀ 1989年秋天，何康陪同江泽民总书记视察湖北。



◀ 1990年5月20日，何康在山东德州主持“三夏”会议后，考察东营“吨粮田”。这是任内最后一次农村考察。左二为何康，左一为郭书田。

► 何康积极推动两岸农业交流。1990年何康与大学同班同学，时任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主任的李崇道(右)在香港会面。他们的老师马保之(中)成了见证人。



► 1993年何康(左二)荣获被称为农业的诺贝尔奖的世界食物奖(The World Food Award)。



► 1993年何康获世界粮食奖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会见何康夫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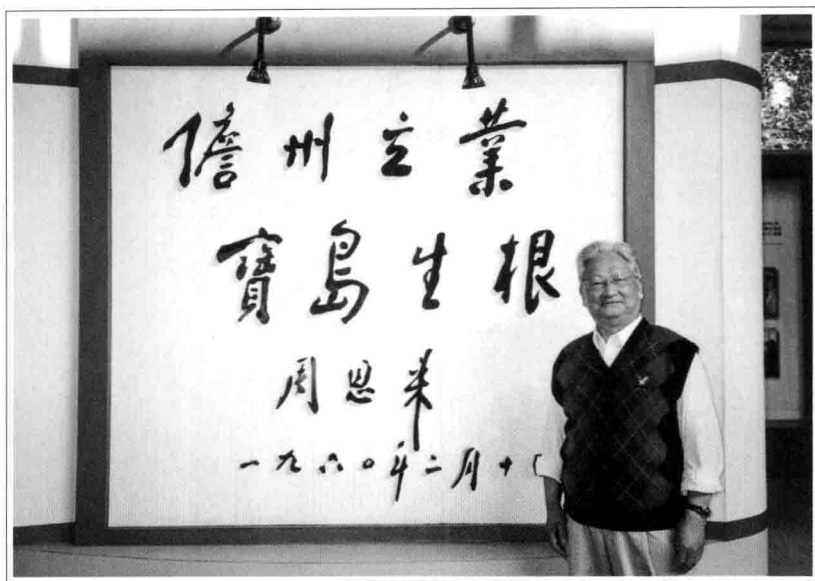




▲ 离休后，每年春节或过生日，农业部的老战友们都会到何康家里聚会。前排左起：宋树有、李易方、刘中一、何康、陈耀邦、郭书田、张巧玲；后排左起：王甘杭、林干、张毅、孙翔、谢国力、张文庆、王永昌、张世贤、张忠山、陈耀春、管金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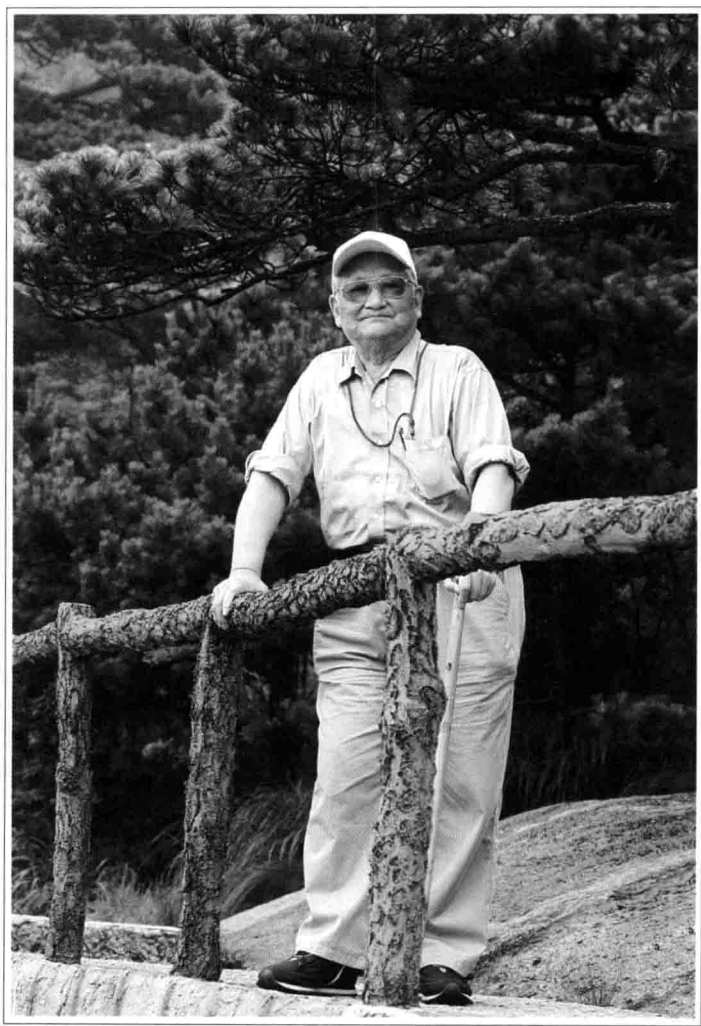
▲ 2008 年何康的父亲何遂诞辰 120 周年，历经三年编辑的《何遂遗踪》出版，何遂后代们聚集一堂。



▲ 2011 年何康重返两院，在周总理题词前留影。



▲ 童心未泯，89 岁祖父与 3 岁的重孙。



▲“老来重晚晴、愈老志愈坚”，2006 年何康登黄山留影。



编委会名单

主 任：

郭书田（农业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

委 员：

向 涛（农业部原区划司副司长）

王甘杭（农业部原农业司司长）

陈耀春（农业部畜牧局原局长）

卓友瞻（农业部渔业局原局长）

张 毅（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

孙泮棋（农业部农垦局原局长）

宋树有（中央驻农业部纪检组组长）

许成文（农业部农垦局原总工程师）

王永昌（中国农学会原副秘书长）

姜伟贤（原林业部中国花卉协会秘书长）

费开伟（农业部科技司原司长）

孙 翔（农业部原教育司司长）

朱丕荣（农业部原外事司司长）

自序

伴随我国农业发展七十年

我和农业结下不解之缘，既传承了家庭的培育和影响，也是老一辈革命家指引的结果。

我的父亲何遂一生爱国勤学。他生于1888年，16岁从军反清，19岁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是北洋第六镇（师）统制（师长）吴禄贞的亲信参谋。吴是北方革命党的灵魂人物，袁世凯派刺客把他刺杀在石家庄。我父亲听见枪声第一个冲到现场，吴的人头已经没有了。他率领第六镇革命官兵愤举义旗，被推举为“燕军大都督”。因为父亲不顾个人安危，在北方反对袁世凯称帝，袁死后，黎元洪大总统派他赴欧美参观世界大战，从28岁到30岁，他到过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1921年他出版了专著《参观欧洲大战记》，疾呼打开国门，向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他也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有着浓郁爱国思想，又比较宽松民主的家庭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我6岁的时候，父亲担任黄埔军校的“代校务”（代理校长、副校长主持校务），天天带我坐小汽艇去上班。他主持修建孙中山总理纪念碑，我亲眼见他面盆盛满墨汁，把纸铺在地上，用扫帚写下“和平，奋斗，救中国”七个大字。这七字总理遗训至今留在黄埔校园孙中山总理纪念碑的东侧，也深深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上小学时，父亲在西安当十七路军杨虎城的总参议。总参议是闲差，父亲的精力都放在考古和旅游上，他多次带我登上西安的古城墙远眺，踏访长陵、乾陵，还攀登了终南山。我不但会背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类的诗句，而且面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广袤苍茫大地，从心底里升腾起对祖国的热爱。

家庭对我的教育有两点是突出的：一是“民贵”思想；一是“农本”思想。父亲给我讲解过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给我说过管仲“仓廩实而知礼节”的论断。他很欣赏晁错，认为《论贵粟疏》是治国之良方。所以我从小就形成一种观念：中国是个大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自古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只有农业发达了，人民才能富足，国家才能太平。

董老指引我选择了学农

家庭也给我们兄弟提供了接触共产党高层的机会。“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力主抗日，他与朱庆澜（朱子桥）将军一起组建了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还请缨杀敌，当了由退入关内的义勇军为主力的55军军长。西安事变后，1937年5月，他便与到达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建立了联系。叶剑英和父亲是很谈得来的，他也关注了我的两个哥哥，我的大哥何世庸就是由叶剑英拉着手交给第一战区政训处处长李世璋，从而到前线去的。我的两个哥哥都在1938年入党并去了延安，我也于1939年5月在重庆南开中学高中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叶剑英把我们兄弟三人党的关系都转到南方局，由他直接领导，叶调回延安后，由董必武直接领导。

1941年年初，因父亲兼任（父亲时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总顾问，举家迁往广西。我当时在成都光华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一年级，组织上同意我随家迁桂。行前的一个晚上，我特地到重庆曾家岩周公馆去见了董老。董老是南方局的主要负责人，他竟像慈祥的长辈那样单独和我这个小青年促膝长谈。他告诉我，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和延安的电讯联系受到严密监控，希望通过广西进行弥补；而且我党也需要加强对桂系的工作，他说广西方面将由李晓亚（李亚群）和我们联系。他指示我要在这个“长期隐蔽”的时期，“勤学、勤业、勤交友”，多学一点有用的知识，将来会有用的。董老问我选修什么专业，我说政治经济系。董老说，现在学政治经济学，无非是亚当·斯密那一套，将来恐怕用不上；不如学一门与民生有关的科学技术，比如农学，将来建设国家更有用处。七十多年过去了，董老当时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文化大革命”中，董老亲自为

我写了有力的证明，解我于困境。革命前辈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关怀，使我终生难忘。

董老的教导和我内心的农本思想产生了共鸣，我到广西大学，修完半年政治经济，便转学到农学院的农艺系，从一年级学起。广西大学农学院在柳州郊区的沙塘镇，那里还有广西农事实验场、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站，所以被称为“战时农都”。广西农事实验场场长马保之是德国的农学博士，农学院农学系主任肖辅是留美博士，当时集中在那里的知名学者还有张信诚、汪振儒、黄瑞纶、李景均、罗君骊、程世抚、柳支英等。农学院的环境宁谧而美丽，周边的马路旁整齐地长着笔直耸立的桉树，一幢青砖的教学楼，几排平房是宿舍，这里一共只有两百多名学生，但学习气氛、学术氛围都是很浓郁的。当年，有两名学生获得中华农学会奖学金（亦称“中正奖学金”），一名是我，另一名是李崇道（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之兄），20世纪80年代，我当了大陆的农业部长，李崇道当了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农业部长），更有趣的是，时任港英当局渔农处处长黄成达也是广西大学农学院的同学；三人曾同住第四宿舍，是同窗好友。1990年，经李政道撮合，由黄成达做东，李崇道和我都到香港，三人一见面就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这次聚会，应该说是两岸三地农业主管官员开创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先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我从广西大学农业学院毕业回到南京，董老把我们兄弟三人的党的关系转到中共中央上海局，此后三年，我在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同志领导下，为新中国的诞生进行了隐蔽战线的工作。这期间，也没有完全离开农业，我创办了栖霞农场、丽群造园事务所；还协助创建中国农业科学研究所，团结了一批农业科技工作者；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农林处处长，和我一起参加接管工作的，就有该社十几位成员。

接管中国旧农业领导机构的感触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分管科教与生产。部长是“佩剑将军”张克侠，副部长是程照轩、刘宪光、金善宝；不久又成立了农委会，主任是刘瑞龙，副主任有我和李人凤、金善宝。首

先遇到的工作是接管原国民政府的农业机构，其中也包括涉外、援外的组织。当时的基本政策是原封不动，全盘接收。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是由我直接负责接收的，该所保存的档案相当丰富；而旧中国长期培养的一大批农业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农业科技人才，是新中国农业接管的最宝贵资产；他们中有许多都是我的师长，我做这项工作是兴奋而快乐的。

我开始较深入地接触旧中国的农业生产。我的感觉是，迭经战乱，农村经济确有凋敝的一面，农业生产的方式普遍落后，有些地方还在用着耒耜之类的古老工具，完全靠天吃饭。但是，悠久的旧中国农业在发展历程中也积累了许多值得深入发掘的经验。比如，苏南无锡一带的精耕细作，山区的梯田、农林牧渔结合，以及“间作套种”、“多熟制”等，里面的学问很大，对我很有吸引力。我清晰地感觉到，在广大的农村、农民中蕴藏着发展生产的极大潜力，如果党和政府的政策引导得当，有科学技术和物质投入的支撑，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

为橡胶北移和热作发展奋斗廿余年

1952年6月，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尽快赶到北京林业部报到。我到京后见到林业部副部长李范五，他是部党组书记（部长是梁希，知名的民主人士），他向我详细地介绍了情况。我了解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我实行封锁禁运，作为军需物资的天然橡胶严重匮乏；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生产天然橡胶。周恩来总理指出，时至今日，胶源已竭，当务之急，是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天然橡胶基地。李范五告诉我，他和高岗一起赴苏谈判苏方援助我国经济发展长远规划时，斯大林了解到中国海南岛有巴西天然橡胶园生产时，非常高兴，亲自提出来，希望苏中合作，发展天然橡胶事业。条件是由苏联提供专家（苏联没有橡胶专家，派来的只有林业专家）、机械、化肥、农药等；在我国生产的天然橡胶，按国际市场价格卖给苏联等国家。李范五说中央对此十分重视，1951年11月，已在广东湛江成立华南垦殖局，由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叶剑英兼任局长。现又决定调两个师一个团现役部队，整体转业到林业建设作为骨干，还要动员20万名民工，作为开垦植胶的基本队伍。业务上由中央林业部新建一个特种林业司负责指导，调你来就是担任这个司的司长。